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想与 企业应对之道

刘瑞¹

【摘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根据当前国内外形势出现巨大变化而作出的重要判断和部署，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举措。实现这个部署要充分利用当下中国经济恢复增长的有利因素，积极应对和化解国内外的不利因素。同时，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循环理论作指导，并借鉴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凯恩斯主义循环理论。实现国内循环的重点是实现从国内生产到流通的良性循环。为此，在生产供给侧要着重建立更加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更加协调的区域经济体系，高质量的价值链，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循环体系。在流通供给侧要着重建立能够满足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需求的流通体系，在供求两端建立起更加通畅的流通运输方式及网络，建立协调生产-流通利益的平衡新机制，建立由信息技术进步改造流通带来的新管理方式，继续对流通产业加大投入，并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和分工。实现国际循环的重点在于积极维护和改进 WTO，同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下，不同类型的企业优劣势不同，外向型企业面临更大挑战，内向型企业面临更多机遇。各类企业都要认清形势，转变观念，采取适合自身特点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双循环” 宏观调控 企业行为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20)12-0005-09

一、引言

2020 年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流行，这场疫情堪比 1918 年开始流行的所谓“西班牙”流感瘟疫。从一定意义上说，那场“西班牙”流感瘟疫助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却引爆了一些国家长期潜藏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中国经济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美贸易战升级、世界新冠肺炎疫情三重影响，也正经历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局面。

作者简介：刘瑞，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北京 100872），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国民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2001—2002 年获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ISEF 项目资助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从事博士后项目研究，曾到荷兰政府社会福利部、中国台湾经济研究院从事学术访问交流活动。2000 年入选北京市新世纪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百人工程”。兼任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评估中心专家、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及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刘瑞教授的研究视野涉及经济转型、政府行为、发展战略与规划、国企改革、产业结构与政策、对外经贸、社会发展与政策、区域经济、国防经济等。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国软科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高转载率。多次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高等教育优秀教学奖、北京市科技进步奖、国家计委科技进步奖、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等。常年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和人民论坛特约撰稿人。代表性学术著作《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的演变与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首都经济圈结构调整的国际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首都经济结构调整路线图》（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6 年版）《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主持的主要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科学发展观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体现研究”（200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子项目“我国中期发展规划评估的理论与方法”（20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我国中期发展规划评估理论与方法”（项目编号：71641026）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下简称“双循环”），这是党中央根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作出的重要判断和部署，必将对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我国企业也应与时俱进、顺势而为，不断调整自身行为，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二、“双循环”所面对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2020 年一季度，中国经济遭受了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国经济同比下降 6.8%，疫情重灾区湖北经济更是下降 30%以上。虽然第二季度艰难恢复到微幅增长状态，但是从全年看，要实现经济增长仍面临重重困难。重启经济增长是重中之重，但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并不是单凭主观愿望就能达成的，需要冷静地对客观条件进行分析。

（一）有利因素

1. 疫情大大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蔓延后，中国是疫情最早得到有效控制的地区。可以说，中国应对疫情策略适当，措施有力，管控有效。经过哈尔滨、北京、大连、乌鲁木齐、青岛等城市的局部疫情反弹及疫情治理表明，无论有无疫苗，中国都已经做好了与疫情长期相处、进行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心理适应、制度调适和物质准备。

2. 制度性优势得到充分显现。病毒没有国界，在哪出现具有随机性、或然性。2020 年 1 月，疫情在中国爆发后，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共同抗击疫情，4 月就取得重大成绩，5 月之后连续发生的部分城市局部疫情主要为境外输入型，并均在短期之内得到有效控制。

3. 美对华极限施压效果暂时有限。自 2018 年 3 月爆发的中美贸易冲突已经持续 2 年多，中美之间贸易总额虽有所减少，但是中方顺差或美方逆差的贸易规模格局没有改变，美方采取让中美经济脱钩的图谋并没有得逞。

4. 国际社会对中国仍持肯定性态度。尽管在此次疫情爆发和应对过程中，中国与部分西方国家发生了尖锐的观点碰撞，但是，从总体上看，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崛起所持的肯定性态度没有发生逆转，在与中方合作应对疫情方面更是得到进一步加强。外资仍在继续进入中国股市和产业领域。随着中国经济率先从疫情中迅速恢复过来，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国再次成为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及经济危机的引擎。

5. 中国对外开放决心进一步加强。中国 40 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没有变，相反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还得到扩大或深化。中国政府采取的进一步降低关税、放宽外资进入市场限制、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和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区试验等举措，都获得了国际社会积极评价，取得了较好效果。

（二）不利因素

1. 从国内看：首先，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还没有完成。经过 5 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国民经济整体质量有所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态势正在形成。但是，这还不足以形成新动能、新经济、新业态不可撼动的地位。疫情缓解之后，一种要把损失迅速夺回来的想法容易在干部群众心中产生，可能易对继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部署造成干扰。

回想 2003 年年中“非典”控制之后，下半年经济就开始发热，一直热到 2004 年上半年，其中热得最快的就是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这使得本来从 2002 年开始推进的经济结构升级部署被耽搁下来。此次疫情过后，会不会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停下来，国民经济重新回到依靠要素驱动而不是创新驱动的老路上去，是值得关注的。

其次，疫情尚未完全消失增加了经济恢复增长的不确定性。据医学专家预测，在没有获得新冠肺炎病毒疫苗的前提下，疫情还可能卷土重来，形成第二波、第三波冲击，这样会对经济恢复增长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不断有局部性疫情爆发，疫情地区经济增长就易被按下暂停键，全国经济增长也将会受到影响。

2. 从国际看：首先，中美贸易战已经开始升级到科技战、人才战、金融战和外交战。美国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激化中美之间矛盾的措施。虽然目前中美经贸关系暂时没有受到根本性动摇，无论是中美之间的贸易还是投资都还没有走入死胡同，但是增长速度下降趋势已经出现。

通过此次两个大国应对疫情截然不同的做法，美方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忌惮心情可能会更加强烈。因此，美国一些人企图推动中美经济脱钩。然而，中美经贸关系是在长期的互利和竞合关系中形成的，美国政府如果要想采取行政干预方式迫使经济关系彻底脱钩定会遇到市场力量的抵制，广大中美消费者和企业会用脚投票来规避行政命令。但是，在部分高科技领域和部分高端产业的贸易、投资和合作脱钩是极有可能的，对此不应当抱有幻想，必须早预期、早准备。

其次，原有的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存在中断的可能。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也反映出经济全球化存在的不足，其中不止有工作岗位转移、环境污染转移、资金转移、人口转移、贫富加剧这些已经看到的问题^[1-2]，还有过度依赖全球高度分工体系造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被动性与脆弱性问题。

疫情过后，经济全球化趋势还会继续，因为世界从经济全球化中得到的好处比失去的还是多得多，何况主导全球化进程的始终是市场力量。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采取了断然的“封城”措施，停止了一切容易引发传染的群体性聚会活动，此时，世界最担心的是中国生产线停转和供货中断。然而，随着疫情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其他国家却又大规模流行起来，此时，轮到中国担心外国生产线停转和供货中断。由此形成的共识或许就是：在经济全球化受阻的情况下，建立灵活、富有弹性和韧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是必需的。

当前，中国已成为制造大国，许多国家半数以上的制造品依赖于中国生产。因此，疫情过后，降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性已成为一些国家的选项，如美国和日本政府公开号召本国在华企业从中国市场退出，并承诺给予企业搬迁补贴。这种“去中国化”的做法对中国企业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美国限制中国企业使用任何拥有美国知识产权的芯片，固然会在短期内导致中方企业芯片供应链断裂，引起企业停工停产，工人下岗，利润减少，阻碍中方经济复苏。

但是，另一方面，限制芯片也同样缩减了美国企业在华市场份额，引发美方企业的停工停产，利润减少，阻碍美方经济复苏。或许最令美方不愿看到的结果将会是，这种做法激发出中方企业寻求产品替代和独立研发的积极性，假以时日，中方企业将在芯片领域做大做强，成长出能与美方竞争的企业。因此，充分利用自身经济优势和有利条件，回避或规避不利于自身经济增长的劣势和因素，是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认识前提。

三、“双循环”的理论解读

任何一个国民经济体的运行都存在着客观上的循环，没有循环，便没有国民经济运行，只不过循环存在着良性和恶性两种状态。良性循环即是不受阻碍的畅通循环，恶性循环即是存在堵点的阻挡，以致循环缓慢甚至停滞。

在现代国民经济体系中，存在着努力保持良性循环的理性动机和放任循环自流不管的自然动机。实现和保持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是所有国家干预的根本目的之一。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时期，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事实上都存在着国民经济内部循环动机和一定程度的外部循环动机，只不过以前的循环受到开放程度过低的条件限制，不得不以国内循环为主，相应地参与国际循环。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条件更好了，开始有了更多参与国际循环的机会。只是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究竟该如何循环运行，以及良性循环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存在着不同的经济理论解读。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循环观^[3]

依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本解释，经济的循环运行包含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并进一步简化为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阶段，其中，关键的是要使得商品生产的价值在循环中得到补偿和转移，并在重复循环中实现生产规模持续扩张和价值不断增值。传统的理解只限于物质生产的循环运动过程。

实际上，现代经济包含了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循环全过程，从经济系统内部自身循环扩展到经济系统外部，与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会、法律、政治、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相互交流和交叉循环。相对于这些派生的上层建筑、精神领域，经济基础尤为重要。

经济基础自身循环良性化，会带动那些派生性领域良性化，反过来那些派生性领域的良性化循环会进一步增强经济基础的良性化循环。这其中两个关键点是：保持两大物质生产部类（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部类）的再生产之间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前提条件下按比例循环持续下去，保持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相匹配地按比例循环下去。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一步揭示：经济循环的最关键部位在流通，这是循环的惊险一跳。因为：首先，在社会化商品生产中，“商品生产以商品流通为前提，而商品流通又以商品表现为货币，以货币流通为前提；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的这种二重化，是产品表现为商品的规律。”^[4]

其次，商品生产第一推动力是货币资本，货币资本投资之后形成生产资本，生产资本完成生产过程之后转化为商品资本，商品资本经过流通之后又变回货币资本。整个“资本的循环过程是流通和生产的统一”^[5]，资本在这个循环之中保值、增值。单个资本生产和流通依序循环，多个资本则可以在各自依序循环基础之上交叉进行，并出现闲置资本游离。

生产与流通是不能相互割裂开的，二者彼此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连接。再次，“资本完成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等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4]然而，决定资本增值的关键不是资本循环的生产时间或是流通时间，而是其中创造价值的劳动时间。因此，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是互斥的，对资本保值增值起的作用是不一致的。“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越吻合，在一定期间内一定生产资本的生产效率越高，它的价值增殖就越大。”^[4]

而流通时间则是对资本增值起消极作用的，因此要尽可能地缩短流通时间来实现资本保值、增值的循环。最后，流通时间分为出售和购买两个时间段，产生相应流通费用，包括纯粹的流通费用（如买卖时间、簿记、货币）、保管费用（如储备、仓储）、运输费用等。

国民经济进入 21 世纪之后，随着人流、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加入到流通领域，流通外延及其相关费用增加不少，形式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流通费用内涵依然是纯粹的流通费用、保管费用、运输费用部分，各种费用都可以内化为这三部分。

在开放型经济体系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循环就不是自我循环，而是与国际的经济体发生联系，出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各自循环和交叉循环。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根据当时经济全球化的特点，着重阐述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循环关系。

依照这个循环逻辑梳理，在经济基础层面，实现国民经济循环既要保持生产内部的畅通循环，也要保持生产与流通之间的畅通循环，更要保持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之间畅通循环。在经济基础层面之上，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

经济内部的各个产业、部门、环节、区域之间都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其中任何一个关系出现破裂都会影响到其他关系的循环。

（二）凯恩斯主义经济循环观^[3]

依照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基本解释，经济运行围绕私人消费、私人投资、对外进出口和政府开支四个部门循环。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是国内经济运行的主要部分；进出口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出现的部门，调剂国内外供求关系；政府开支作为特殊的国内部门，可以同时私人消费和投资产生正反方向作用，可以对国内外供求关系进行必要的管控影响。当市场供求失衡、消费严重不足时，政府开支增加将会拉动经济增长，恢复市场平衡，也就是保持经济持续循环下去。

当私人消费扩展到公共消费领域，也就是进入到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领域，如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大众体育、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时，私人投资也是有一定效率和必要性的。但是比较而言，由于收益的外部性特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一般效率更高，社会效益更明显。政府对公共产品领域的主导作用，是维系经济与社会、生态循环的主要力量。

这个经济理论是流行的市场经济理论，它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不同的是，注重经济循环现象分析而忽视经济循环本质分析。此外，这种循环是半封闭的，只考虑到了货物进出口循环，而忽略了现代经济体最重要的投资和金融内外循环。在完整的开放型经济循环之中，需要把国际收支平衡、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循环之中。总之，基于凯恩斯主义四部门分析的循环模式也是理解国民经济循环的理论逻辑，对解决市场短期运行失灵问题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依照这个循环逻辑梳理，中国各个经济要素和资源要素之间都存在着相互联系和彼此影响的关系。在资源配置领域，需要建立政府看得见之手与市场看不见之手相互协调关系；在市场领域，需要建立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协调关系；在对内需求领域，需要建立投资、消费之间协调关系；在对外领域，需要建立进口与出口、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之间协调关系，等等。

总而言之，努力保持国民经济各个要素、部类、环节等的比例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循环的基础。只有国内经济循环实现了良性化，才会延伸到其他领域，形成经济与社会、生态的良性化循环。虽然外部经济的循环难以掌控，但是，可以通过积极寻求国内经济良性循环来抵御国外市场造成的威胁，积极引导国外市场的各方面因素向有利于国内经济的方向转化和发展。因此，全部的良性循环基础是国内经济。国内经济循环基础若不牢，就会地动山摇。进一步说，已经形成的国内外经济循环和经济与非经济活动循环，会受到各种情况干扰而出现堵点，畅通整个经济内外部循环，就是要寻找出妨碍循环的堵点。找出堵点，再想办法化解这些堵点，就能继续畅通国内外经济关系和经济与非经济关系，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循环下去。

四、“双循环”构想的重点

（一）推进国内生产良性循环^[5]

在疫情缓解之后中国已经陆续出台了一些推进国内循环的重要举措，比如，上万亿元“新基建”规划，上万亿元企业减税措施，上百亿元地方政府消费券发放，上百万人就业安置安排措施，等等。然而，这些刺激需求的举措只是短期性的，恢复经济增长不能仅靠短期刺激，更需要着眼于中长期部署。保持国内经济自身良性循环是比恢复经济增长更加重要的任务。目前需要明确如下推进国内生产的循环重点：

1. 建立更加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启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以自身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参与了最初始的全球分工体系，以“三来一补”的方式换回了宝贵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此后通过积累和复制技术知识，中国开始建立起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和现代基础设施体系。然而，不少尖端技术和高端供应链却被控制在外国生产商和供应商手里。疫情爆发之后，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更加突出。

基于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设想，所谓的高中低端产业和上中下游供应链都是必须拥有的。建立完整的产业链重点在两头：一头是尖端产业，一头是低端产业。此外，在疫情没有发生之前，中国就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建设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不应当与这个任务相冲突。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并不属于产业链和供应链上需要补上的短板，因此，没有必要又大规模地让其卷土重来。

2. 建立更加协调的区域经济体系。中国国土幅员辽阔，但是区域经济分布不均衡。通过推行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地区协调平衡战略，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有所减少。但是，区域经济差距是长期形成的问题，仍然需要持续不断加以解决。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行 20 年来，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在此过程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体系和中心城市建设和硬件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是生产要素的聚集和深度开发尚未完成，西部城市群尚未形成，西部地区的资金流、商流、人流、物流还在继续单向流到沿海。因此，应将制定西部大开发二期战略（西部再开发战略）作为建立更加协调的区域经济体系的切入点。西部大开发二期战略工程需要更高站位和格局，建设美丽大西部、发达大西部、幸福大西部、开放大西部。西部再开发的重点是利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实现西部经济跨越式发展，让资金流、商流、人流、物流从沿海发达地区反向流动到西部。

3. 努力建设高质量的价值链。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未必能够形成高质量的价值链，这与分工体系以及产出效率有关。在疫情缓解之后，发展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无接触经济等成为一种政策导向。然而，这仍难以更好提升从业人员的经济价值和产业的附加值。在经济全球分工体系中，中国的经济竞争力长期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付出的努力与获得的回报不成比例，高额附加值被别的国家拿走。建设更高的价值链需要从完善产业链和供应链做起，同时，还必须具有相对独立性。建设高质量的价值链，不仅可以尽快增加居民收入，关键还可以培育经济竞争力。

4. 构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循环体系。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凸显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此次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是实体经济，恢复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也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才更能体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对虚实两种经济体之间关系的认知和政策调整早在疫情前就已开始，然而认知断断续续，常有不同声音进行干扰。借疫情之后重启经济增长之机，应当下决心将脱实向虚的趋势扭转过来。因此，重构虚实经济体的利益分配格局是构建良性循环的关键。

（二）推动国内流通良性循环

经过“十三五”时期的“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煤炭、钢铁、汽车、商品房等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已经得到压缩或控制。但是，在另一方面，流通领域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在疫情爆发之后，产能过剩不再是主要矛盾，而物流不畅则是突出问题。因此，在部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2020 年 9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把建立现代化流通体系作为下一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这是有深意的。

1.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首先要求建立稳定而健全的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流通体系。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建立健全已经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因此，流通体系现代化应满足这个要求，防止在这两个链条上发生流通脱链现象，不能出现流通断点。通常所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实际上是一回事，犹如一个钱币的正反面。处在这种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企业，对上游企业是产业链节点，对下游企业即是供应链节点。产业链分成核心零部件产业链和外部配套件产业链。在大而全的一体化集团公司之下，几乎所有的核心零部件和外部配套件都从内部生产和提供，因此，流通大部分呈现内部化现象。发生的外部流通主要是一次性出售和一次性购买。然而，这种境况是少数，大部分的现代化产业都是社会分工化程度极高的产业，其核心零部件和外部配套件都需要通过外部流通来满足。对于高度依靠外部供应和销售的企业，满足流通需求有两种基本选择：或是建立自组织流通机制，或是依赖他组织流通机制（第三方物流）。实事求是而言，自组织流通机制与他组织流通机制具有各自特点，并无优劣、高下之分。曾经有一段时间，第三方物流被誉为最佳的流通机制引入到国内流通领域，然而效果差强人意。对于大宗货物卸载和大型运输机械运用的物流形式（如港口、码头），这种他组织流通机制是有专业化优势和高效率的。但是，对于零散货物和分布式运输的物流形式（如批发零售超市），自组织流通机制反而具有内在交易成本可控的优势，效率较高。所以，

依据不同的产业链、供应链特点建立不同的流通机制是必需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催生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全面重组，也势必催生相适应的流通机制选择和重组，关键是要找到更具效率、更具节约流通时间优势的流通组织机制。

2.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在供给端和需求端之间建立起更加通畅的流通运输方式及网络。生产在供给端，消费在需求端，因此物流在两端之间直线距离越短，时间就越短，效率也越高。而现实中大量的急需商品积压在流通中，就是因为走了许多弯路和冤枉路。所以，建立现代化的流通体系，就是尽量走直路，减少弯路，缩小小路途。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流通硬件和软件的高度契合和配合。流通硬件包括传输基础设施和传输工具，通常由五种流通方式组成：船运、航运、铁运、路运和管运。流通软件包括传输线路设计、传输规制、传输信息管理等，其中，流通效率最低的是传输过程中形成的空载往返率，而流通效率最高的是传输过程中形成的满载往返率。要减少空载率提高满载率，就需要利用现有流通硬件和软件进行优化规划，在供给端和需求端之间形成网络化的综合运输体系。因此，要大大便利流通、提高流通效率，关键是要形成满足高效流通需求的综合运输体系。

3.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建立协调生产-流通利益的平衡新机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合理控制流通利润。正如理论上所论证的那样，就商品的价值创造而言，生产领域创造价值，其中，生产时间中的劳动时间是创造价值的关键。流通领域是实现商品价值的一个不得不经历的环节，其中，付出的流通劳动也创造一部分价值，流通资本投入也因参与价值创造活动而要有要素回报，最终作为附加值随同商品出售而获得补偿。但是，所有这一切付出以及利润回报都是附加的，都是以销售出流通的商品为前提的。商品是皮，流通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更不能出现买椟还珠、本末倒置的反常现象。经常去日韩的人都有体会，日韩人送礼品都很讲究，礼品大多都有精美的包装。但是相比较而言，中国商品普遍存在着过分讲究包装的现象。这种过度包装虽然一点也不能增加商品使用价值，但是却往往能增加流通企业的利润，导致出现过度注重产品包装现象。流通领域追逐利润最大化，势必侵蚀生产领域的利润，变成造的不如卖的赚钱，长此以往，就没有人愿意生产，都去经商，结果就会回到经济不可可持续发展的重商主义时代。化解生产与流通之间利润分配不公平的市场化之路是充分的市场竞争，让利润平均化规律调节生产和流通之间的利润分配。然而，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还尚未成熟，仍存在着实体经济难做、实体经济不如虚拟经济来钱快的现象。虽然流通领域不完全是虚拟经济，但是部分流通领域的利润的确存在虚高现象。因此，要建立健全现代流通体系，也需要对流通利润加强调控，促进流通领域的市场竞争，打破流通领域的行政和经济垄断。

4.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建立新的管理方式。从国民经济整体循环角度看，流通时间趋向零是最佳状态，零库存、零销售、零流通是最理想的。因此，流通的变革方向始终是减少流通时间，以更快捷、更便利、更高效、更便宜为要求。完善流通组织、流通体系和流通制度是需要的，但是这些都有赖于技术条件。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对流通带来影响和冲击。当下正处于信息技术全面进步和推进的时代，这给流通领域带来各种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传统的流通组织和方式越来越不适应这种信息技术的变化，需要有所改变，比如：数字货币、虚拟交易、扫码交易就带来流通金融结算方式变化，但在老年人群、传统小微企业群中却遭遇不适应；而另一方面，适应信息技术的新流通组织和方式还在探索和试错中，比如跨境电商形式。当新的流通组织和方式尚未建成、健全时，旧的流通组织和方式也不会轻易退出，期间会出现巨大的空档，产生新旧对立矛盾和交易成本。比如：线上销售和线下送货，线上交易和线下交割，制造与销售同步完成，制造与服务一体化，不仅引发市场交易行为本身变化，也引发市场交易前后行为的变化。有许多交易行为存在规制真空，给一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伤害了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所以，在大力采用信息技术来升级流通方式时，也需要小心谨慎跟进规制，更新管理方式，化解新的流通矛盾。

5.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依然需要对流通产业加大投入。通过长期建设，中国的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流通工具改造都有了长足进步，有的流通工具如高速运输和海运已经达到世界级水平，国内高铁“八纵八横”格局已经趋于形成。这使得中国具备了建立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流通体系的物质基础。然而，随着国内大循环以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时代的到来，新的流通产业需要更大的投入。投入的重点要有选择，比较而言，信息技术运用重点在5G基站和数据库，运输流通方式采用重点在网络配套设施，区域布局重点在流通死角。如果有更加雄厚的资金支持，可以把连接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跨渤海海底隧道工程提到议事日程，也可以把扩大长江、黄河等主要河流的跨河大桥，穿越西南和西北部地区主要山脉的隧道工程列入未来流通产业的大投入项目。总之，流通大发展的根本是以空间换时间，地理空间距离的缩短就是流通时间的减少，就是国内大循

环的提速。

6. 建设现代化流通体系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和分工。70 多年来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有一个有为政府和改革政府。这个经验适用于当下推进流通现代化体系建设，因为绝大多数流通基础建设和流通工具使用，都是公共产品。世界范围内的经验都表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要高于市场。所以，在未来现代化流通体系建设过程中，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主角。但是，政府不是全能的，也不能包揽一切，因此要在现代化流通体系建设中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各自分工，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到现代化流通体系建设热潮之中。一般而言，政府可在现代化流通体系的建设规划、重大项目审批、特别项目实施和管理、重点资金筹集以及治理流通领域的各种乱象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市场主体在子项目施工、一般项目设施运营管理、面向基层用户服务方面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个市场主体是一个集合，包括了国企、民企和外企。随着中国现代化流通体系建设帷幕拉开，会有许多拥有竞争实力的国际企业愿意进入这个市场，因此不应该拒绝和排斥，相反应当积极地引入，采用国际通行商业运作方式接纳外资进入。中央已经明确，大循环绝不是封闭式的，而是更加开放式的。因此，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前提下积极引入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加入现代化流通体系建设应该是重要举措。

（三）推动国际良性循环

就外部循环而言，中国已经参与了两个循环平台，一个是借助世界贸易组织搭建的平台，另一个是中国从 2013 年开始搭建的“一带一路”平台。建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从这两个平台着力。

1. 维护和改进以 WTO 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平台。中国于 2001 年正式加入 WTO 之后，虽然经历国内 2003 年“非典”冲击和国外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但是依靠自身经济优势和国际合作，一路前行。虽然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是依然在世界经济体中居于增长前列。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即使在疫情爆发后部分国家出现了“去中国化”的声音，但是经过仔细分析和利益权衡后，中国该调整的要作调整，该继续开放的仍然要继续开放。同时，应积极参与 WTO 组织以及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的机制改革，并将经济全球化的理念从经济共同体提升到安全共同体、健康共同体、卫生共同体、环境共同体的新高度。

2. 经营好第二个经济全球化循环平台——“一带一路”。从严格意义上讲，“一带一路”还不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平台，而是经济区域化的平台。但是，在当下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格局下，它是中国人主动倡议发起的国际经济循环平台，这个平台搭建时间虽然不长，从 2013 年提出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运营，再到现在，短短 7 年时间“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和明显成效。截至目前，中国已与 138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6]。平台搭建起来之后取得了许多成就，如中欧班列、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的工业园和大型项目建设，但是也有一些失败个案。对于“一带一路”平台，国内外也存在着误解甚至被污名化。其实，“一带一路”开行之初，就将“五通”（政策通、设施通、贸易通、资金通、民心通）定为平台建设核心。“五通”符合参与各方的想法和利益。只要好好按照这“五通”去做，循环应该是越做越好，路子应该是越走越宽。

五、“双循环”中的企业行为调整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想给中国国内企业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这些机遇和挑战因不同类型的企业而各自呈现不同的情况，并不容易笼而统之地列出。或许对一些企业而言是机遇，而对其他一些企业则是挑战。因此，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不搞一刀切的企业发展政策而实行一企一策是必要的。有关企业类型的划分种类很多，比如：外向型和内向型企业、制造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传统企业和高新企业等。这里主要从外向型企业与内向型企业视角分析应如何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一）外向型企业的行为调整

显然，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外向型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巨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培育了一大批市场、原料“两头在外”的企业，以及与外商进行密切合作的“一头在外”企业。这些企业主要从事贴牌加工和组装生产经营活动，其生存与发展主要依赖国外市场的需求订单和供货渠道，一些关键技术和专利也被掌控在外商手中，在国内没有完整产业链和供应链。在经济全球化没有受阻的状态下，外向型企业尚能维持正常的生产与流通运转，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从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获得稳定的收益。但是，正如前面分析的，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打破了这种平衡。随着国外市场需求萎缩，生产订单大大减少甚至为零，供货渠道中断，外向型企业顷刻之间陷入困境。

实际上，早在 2013 年中央作出经济新常态判断时，外向型企业就需未雨绸缪进行调整。然而，或因为目光短浅、或因为转型成本较高、或感觉市场前景尚可等，一些外向型企业没有及时转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这类企业应当尽快进行转型。其实，外向型企业的未来出路仍然很广阔，因为这类企业比其他国内同质企业拥有更好的内部优势，比如：更加健全的内部治理机制、更加优质的人力资源、更加丰富的国际经贸经验、更加成熟的生产工艺流程、更加先进的生产设施设备，等等。因此，面对新的挑战，外向型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内部优势和外部机遇突破困局。一般而言，外向型企业的行为选项依次为：第一，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稳定原来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关系。尤其是针对美国市场，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言放弃。第二，出口转内销，积极培育国内市场。这个办法在应对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就已经采用过且成效明显。第三，寻求新的外部市场和原料替代，重组供应链。第四，组织技术攻关，实现企业生产经营的彻底转型。此策应当是企业通过生产经营重组，告别旧的产业链，组建新的产业链，以拥有自主技术为关键，从而实现技术突破而迎来企业新的转型机遇。

（二）内向型企业的行为调整

内向型企业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机遇要多于外向型企业。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国内消费需求就持续升温 and 升级，这一状况也已经被统计数据所证明。首先，消费依赖可支配收入。近年来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引领消费升级的主要是中等收入人群，随着低收入人群不断流动提升到中等收入阶层，也会不断释放消费能量。其次，各种不利于消费的制度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下趋于消融。以前常被提到阻碍消费的看病贵、上学贵、住房贵等因素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已经有了较大的改观。近年来居民银行储蓄余额的持续下降，反映出基于以上储蓄动机的减少，这是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最后，被疫情压制的国内消费需求将在新政刺激下释放出来。疫情以来，各地政府纷纷推出消费券、地摊经济、夜市经济、直播带货网红经济等措施，在短期内更是刺激了消费需求。此外，各地政府还出台了针对企业的救援解困计划，所有这些都形成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助力内向型企业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无疑，内向型企业是双循环新格局中的主力军。

然而，内向型企业同样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不能赶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列车。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无人机、新能源、新材料、新医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革命，正在前所未有地改变当下的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危机都孕育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引发产业革命。一般而言，内向型企业已经在国内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因此不必像外向型企业那样担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其最大的担心就是被新一轮技术革命甩出去，导致企业生产经营从辉煌走向衰落。

因此，在双循环新格局中，内向型企业必须首先认清形势、转变观念，积极拥抱新技术革命。对新技术的犹豫不决和患得患失心态，会影响内向型企业的战略发展。其次，要积极采用新模式、新工艺、新业态，适时更新企业生态。并非所有新型的模式、业态、工艺都适合所有的企业，但是总有一款适合一个企业，关键是要积极寻找这个新模式、新业态、新工艺。最后，寻求占据更高的价值链位置。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是内向型企业的外部优势，但是并不一定占据价值链的高端。价值链当然依附于有序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但是能否占据价值份额比例较大的链条一端，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竞争力强的企业可以在中低端产业链和供应链中获得较高价值份额。反之，竞争力弱的企业即使占据了中高端产业链和供应链，也未必能够获得高额价值份额。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市场份额最大化才是内向型企业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
- [1][美]托马斯·弗里德曼, 著. 王玮沁, 等译. 世界又热又平又挤[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 [2][美]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著. 李杨, 章添香, 译. 全球化及其不满[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 [3]刘瑞.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4][德]马克思, 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资本论(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5]刘瑞. 重启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思考[J]. 人民论坛, 2020, (7).
- [6]刘丽靓. 发改委: 我国已与 138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EB/OL]. 中证网, 2020-09-14.